



中国人的乡愁

□ 高玉敏

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……”余光中先生的一首《乡愁》惊艳了海峡两岸，触动了中国人心底那一根最柔弱的琴弦。其实，当你迈出离开家乡的第一步时，乡愁就偷偷地占据了你心中的某个角落。卢纶在漂泊中“行多有病住无粮”，因此感叹“万里还乡未到老”；韦庄面对“洛阳城里春光好”，同样也感叹“洛阳才子他乡老”，所以，有人说，乡愁是一种病，一种随时会发作的“病”，融化在你不能回归的日日夜夜。

触处皆是乡愁

远行的游子，人在他乡，经历了春秋代序、斗转星移，看惯了霜露林木、北雁南飞，遭际了江湖秋水、世情况味，在与家疏离的漂泊中感受着乡愁的苦痛。对于涌起乡愁的人来说，周遭无一不是可感之景，无一不是可触之情。时空间隔、冬去春来、物候变化，都会引发游子内心深处乡愁。不论是少小离家的贺知章，还是离家十年的吴文英，不论是与故乡仅一水相隔的王安石，还是离家万里的王维，不管你走了多久、走了多远，乡愁一起，失魂落魄。武元衡感叹：“春风一夜吹乡梦，又逐春风到洛城。”陆游感叹：“砧杵敲残深巷月，井梧摇落故园秋。”如果遇到四时八节，团圆之日不能团圆，会更增凄楚，王维便感慨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欧阳修在《戏答元珍》中用“归雁、沉疴、新年”写乡愁，柳永在《八声甘州》里用“暮雨、霜风、关河冷落、红衰翠减”写乡愁，陆游在《临安春雨初霁》里用“春雨、客居、世情薄、风尘叹”写乡愁，总之，周遭的情与景随时都能够触发乡愁。或许每位游子都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，用不同物象建构自己的乡愁语境。

含蕴和谐的乡愁

“乡”本来是古代农村管理的一级行政单位。《周礼》上说：“五家为比，使之相保；五比为闾，使之相受；四闾为族，使之相葬；五族为党，使之相教；五党为州，使之相哺；五州为乡，使之相宾。”虽然每级单位管理的户籍多少不同，但是行政单位的基本属性是一样的，但是为什么在“比”“闾”“族”“党”“州”的众多选择中，最终“乡”脱颖而出，成了故土的象征呢？二人为比，“比”表示并列的五户人家；“吕”是人的脊椎骨的样子，胥节相连，“闾”表示二十五家门与门相连；“族”“党”表示集中，一百家是一族，五百家是一党，“州”表示居住的区域，由人的居住地代指居住地上的人，二千五百家是一州。“乡”的繁体字是“鄉”，甲骨文写作“𠂔”，左右是二人，中间是食物，像两个人相对用餐的样子。相对用餐意味着关系和睦、亲近，所以《周礼》才说“五州为乡，使之相宾”。设立“乡”的初衷是希望居住在一起的一万二千

五百户人家和睦相处、睦邻友好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里有人与土地的和谐，有人与环境的和谐，也有人与人的和谐。比较起来，“乡”给人的感受除了“比”“州”之类表示集中居住的生活模式和居住区域之外，还意味着和睦、温情、亲近。当一个人远离家乡，单身在外，往往会回忆起那一份和睦的温情，为孤寂冷清的生活带来慰藉，这就是“乡”带来的巨大文化张力。“乡亲”“乡音”“乡情”“乡邻”无不意味着温情，带给人悠远绵长的思念，“梦乡”“睡乡”“醉乡”“温柔乡”同样表达了一种使人沉浸其中不愿自拔的涵义。

源于土地的乡愁

“乡”是那一片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，而中华民族是依靠土地繁衍生息的民族。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，与从爱琴海孕育的西方文明不同。东汉刘熙的《释名》说：“土，吐也，吐生万物也。”家乡的土地养育了千千万万的民众，是人们生存的根基。“家”“宁”“宜”“宴”等汉字形体都有表示住在家乡的房子里，获得宁静、安居的生活的涵义，而离开家乡就是他乡之“客”，就是“寄”人篱下。所以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故乡，不愿随意迁徙，《汉书·元帝纪》就说：“安土重迁，黎民之性；骨肉相附，人情所愿也。”而一旦客居在外，无论从地缘上、心理上都会感觉漂泊，这是一种身体寄寓在外的流离，一种心理远离家乡的孤独，对故乡回归的向往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乡愁很抽象，因为它是一种情感，但乡愁又很具体。“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”“乡”也许很小，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，但也会很大。到了县里，同一乡就是同乡；到了省里，同一县的就是同乡，到了全国，同一省的就是同乡，到了国外，中国人就是同乡。海外华人的乡愁就是对他们血脉根源所在的中华大地的思念。

无可消除的乡愁

乡愁，轻轻的、淡淡的。贺知章的乡愁是家乡的那一片镜湖，王维的乡愁是家乡那一树寒梅，席慕蓉的乡愁是家乡那一曲清笛，有些人的乡愁可能是外婆裹的粽子、妈妈烙的韭菜盒子，可能是一杯杏仁茶、一碗油泼辣子，也可能是爷爷场院里的故事、母亲傍晚晚归的身影，甚至是村头那一股暮霭炊烟的味道。乡愁，又是沉沉的、浓浓的。“此愁无计可消除”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别人眼里司空见惯、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你却可以下笔千言、品味终身。有人羡慕说走就走的潇洒，但是行走的中国人永远背负着这份既轻且重、既淡且浓的乡愁。乡愁伴随着我们从盘古女媧那里走来，从长江黄河那里走来，它不是包袱，它是我们最根本的血脉，是我们民族的印记。没有了乡愁，我们不仅身体远离了家乡的土地，心理也远离了民族的精神气质。乡愁是中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基础，乡土的厚重能抵消无根的漂泊，乡土的和谐能消除对立的异化，乡土的顺天应时能维护生态的和谐，乡土的家国同构能维系国家社会的稳定。中国人带着乡愁走进了工业文明、走进了新世纪，相信我们还会带着它一直走向更美好的未来！



等贵贱均贫富 损有余补不足

□ 杨小宸

纵览历史典籍，“等贵贱”“均贫富”“损有余补不足”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君王之治的相关论述中均有记载。比如《荀子·君子》中“等贵贱，分亲疏，序长幼，此先王之道也”；《群书治要·韩子》中“明主之治国也，适其时事，以致财物；论其税赋，以均贫富”；再比如《群书治要·汉书二》中“取于有余，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余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”等等。等贵贱均贫富、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思想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，并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、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社会理想。

所谓“贵贱”，刘宝楠在《论语正义》中的解释是“古称有爵禄者为贵，无爵禄者为贱”。“等”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解释为“齐简也”，段玉裁注“引伸为凡齐之称”。所以“等贵贱”可以理解为，人无论是否有爵禄，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之分。像《庄子·秋水》中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”；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中“物无贵贱，因其所贵而贵之，物无不贵也；因其所贱而贱之，物无不贱也”，都蕴含着对人在本性上平等但习性使之不平等的深刻理解，以及人们对人格平等的理想追求。

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，也强调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等人性上的平等。但在社会治理

中，“等贵贱”更倾向于解释为“贵贱有等”，比如《荀子·君子》中“贵贱有等，则令行而不流”，这虽然看似是对平等的否定，实际上却是维护人格平等的一种方式。儒家认为，社会分工的高低有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，于是他们用礼法来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行为道德，使“贵贱如其伦”，这恰恰体现了儒家承认在伦常道德面前人人平等。正如《孝经》中对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、庶人的孝要求不一样，儒家认为不同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起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，身份地位越高，影响范围越广，责任越大，与之相对应的要求也就越高，这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，亦是一种平等。

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，“均贫富”也体现了平等。所谓“贫富”，皇侃在《论语义疏》中解释为“乏财曰贫”“积蓄财帛曰富”。“均”，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解释为“各得其分”。所以“均贫富”是指百姓无论是有财产还是缺乏财产，都能得到与其劳动相应的回报。相对于财富的积累，古人更看重财富的“均”。《论语·季氏》中孔子就说，“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因为治理国家，百姓收入基本平均，就不存在贫穷。社会和谐，人们安居乐业，人口就不会减少。民心安定，国家就不会有倾覆之患。由于

中国传统社会奉儒家思想为文化统治基础，因此，历史上的很多君主都意识到了“均贫富”的重要性，认为“均贫富”有利于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发展。

春秋时期，韩非子就提出要顺应时节调整税收以“均贫富”的见解，他说“明主之治国也，适其时事以致财物，论其税赋以均贫富”。管仲也提出了“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”，主张政府统一征收食盐，再以较低的价格转卖给平民，避免财富过多流入商人手中。到了秦汉时期，各诸侯国之间的国界被打开，土地兼并和私有化的盛行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汉朝政府除了沿用和发展了管仲的分财思想提出了“平准法”，还通过让富人买爵的方式获得更多财产，从而既保证了政府的用度，又减轻了贫民的赋税。到了唐朝，朝廷又根据百姓的资产情况设置了不同的税收等级，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，都是为了使人们公平地获得财富。

老子说，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”，“均贫富”正是天道“损有余补不足”的一个重要体现。天道之所以减损有余、增补不足，是因为天地的无私之德，亦如《礼记》中孔子所说：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”由天道及人道，《易经·谦卦》中说“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称物平

施”，“裒多益寡”即为减损有余以增补不足之意，此句教导人们要效法天地“损有余补不足”的规律，平等施物。自尧舜禹汤，到文武周公，古代圣王都奉行天道的大公无私，以追求理想的“大同”社会——“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，皆有所养”，这也正是中国古人对于平等社会的终极理想。

“损有余补不足”的施用，体现了古人对于盛极必衰、消极必长的深刻理解。在古人看来，“有余”和“不足”都不是恰到好处中庸之道，在《群书治要·文子》中就这样说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真正的富足，并不是财物多，而是人们的欲望得到节制、不必要的事情得以减少；真正的缺失，并不是没有财物，而是民心浮躁、社会奢侈浪费的风气盛行。因此，古圣先王并没有主观创造出来一套治理方法，而是顺应自然之道去引导人们的性情，这就是至德之君的治国之道。



春染绿堤

□ 赵海星

起，一座现代化的铁路桥飞架河上。历史和现实就这样穿越时空交错在一起，印证着沧海桑田。

此时已近黄昏，夕阳如火，万丈霞光氤氲弥漫。微风徐来，芦苇摇曳，碧水荡漾，尘埃在落日下升腾，飞鸟于平湖上惊起，远处疾行的高铁划破一色水天，万物滋荣，天地宏阔。

二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

流水潺潺，岁月冉冉，在河边往往更容易感受到时间的流淌。漫步永定河畔，眼前的波光恍惚间幻化为往昔的场景。

永定河古称桑干河，也叫无定河。在历史的烟云中，长河故道随国运更迭不断变迁，粼粼波光沉浮着数代王朝命运，金沙黄土掩埋了几多家国悲欢。南宋年间，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，更改“隆兴和议”条款，在此驻夜宿馆。此行凶险，南朝重卿贵胄皆畏俱不前，范成大慨然受命。五更鸡鸣，范成大夜不能寐，临窗遥望，见夜天沉沉，大河东去。想起自己身负重命，胸中波澜起伏，挥笔写下“袖里天书咫尺，眼底关河百二，歌罢此生浮”。此后在金国廷议中，范成大言词慷慨、据理力争，最终，得以保全气节而归。

永定河，永定河。在你那呜咽的身影里，流淌着多少人的前世今生，寄托着多少人的喜怒哀乐？

先有永定河，后有北京城。永定河源起黄土高原，在高山峡谷积蓄成势，在平原腹地激荡而出，在千里京畿大地肆意奔流，形成了面积巨大的洪积冲积扇，填埋到“北京湾”凹地里。咆哮的河水带来了平原的生长和丰富的水源，滋养了北京这座煌煌千年古都，也带来了泥沙和水患。历史上，永定河十年一决口、百年一改道。明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九月，万历皇帝视察永定河，见河水漫卷、泥沙俱下，不由心生感慨：观此水可知黄河矣！清乾隆皇帝曾在诗中写道，“永定原无定。”当年的永定河，就是这样一条善徙、善淤、善决的河流，灾患频频不断，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苦难。

为了让永定河安澜，历朝历代都进行大力治理。从明代的“筑堤束

水，以水攻沙”到清代“疏筑兼施”，始终在同永定河患作斗争。于成龙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冯玉祥等名臣都曾在永定河治水修坝，沿河流域至今还有石景山镇恶龙、关公挥刀拦洪水、灵官背观音过河等传说。清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，经过大规模治理后，河道相对稳定，为祈望这条大河永远安定，永绝水患，康熙皇帝为这条大河赐名“永定河”。在河流的孕育滋养和希望洪流能被驯服之间，永定，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盼。

光阴如流水，将往昔峥嵘裹挟而去。现在的永定河，已经没有当年的桀骜不驯，滚滚浊浪化为一河碧水。但是数千年岁月层层叠叠的堆积痕迹并未消逝，它镌刻在诗词典籍的字里行间，藏匿在大河两岸的古巷弄里，流传在戏曲民俗的故事深处，赋予了永定河经历沧桑后的深刻和从容。那些封藏于时光深处的气息韵味，那些历史长河中器宇轩昂的身影，在眼前一片澄澈波光中逐渐清晰。

三

在绿堤公园，有两件事令人颇为惊喜。一是公园的土不是北京常见的棕土，而是金黄的沙土。二是公园里的树木都不高，并没有大河两岸绿树婆娑的盛景。

带着好奇，我请教了一位正在清理杂草的慈祥长者。我以为他是园林工人，其实不是，他只是附近的一位普通居民，因已退休，闲暇时便来公园义务劳动。他对永定河的事如数家珍。永定河附近过去是北京的风沙源头，20世纪90年代到处都是砂石场，沿河两岸的自然环境较差。当地有一句俗谚，“晴天一片沙，有风地搬家”。

“当年永定河，都已经看不到水了，每到春秋季风起时，黄沙漫天，连窗户都不敢打开。直到2008年在这附近建了许多绿地，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，环境才有了好转。现在这里的土还是沙土，树也没有长高。”他笑呵呵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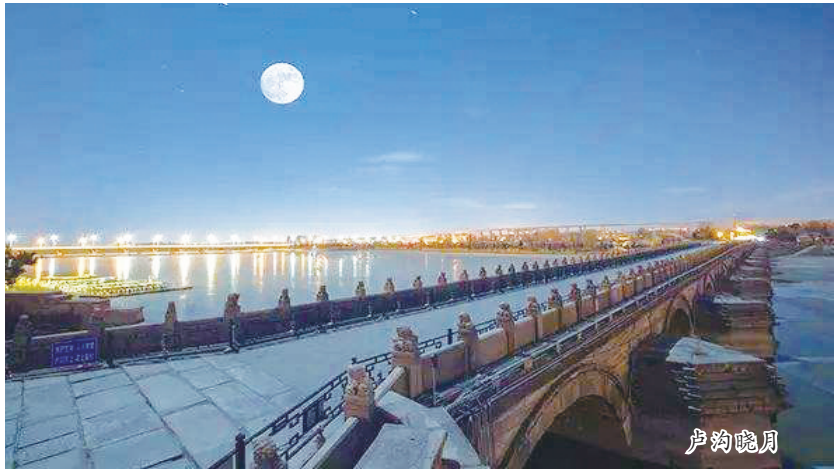
谈越投机。我曾在军队工作10余年，他是1980年代的老兵，共同的军旅经历带来了不少话题。

“离这不远的世纪森林公园，有片林子就是咱们解放军植树造林栽种的，那会儿我在部队，也参加了。那是1999年的事，现在里面还有个纪念碑。”他边说边用手指向远方，我顺着方向看去，天边郁郁葱葱，绿树成荫。20多年时间，当年的稚嫩小苗渐已亭亭如盖，曾经的执甲青年已华发初上。

我站在永定河畔，西下的夕阳迸发出万缕金光，光彩夺目，无比绚丽，天地间被流光溢彩所笼罩。看着如此壮丽河山，我会为孤身出使金国的范成大而感慨，会为千载治水的名臣重吏而喟叹，也会为守护这片丹林碧水默默付出的普通身影而感动。在这个不一样的春天里，还有无数战疫逆行的平凡英雄，他们用微光烛照点亮了生命的希望，也时刻令我动容。

无论时空如何变幻，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沸腾热血。这是中华民族金堤永固的底气，也是这个春天真正的底色。

春染绿堤，家国安好。



卢钧晓月